

敦煌学五十年

〔日〕 神田喜一郎 著

高野雪 初晓波 高野哲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敦煌学五十年

[日] 神田喜一郎 著
高野雪 初晓波 高野哲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学五十年/[日]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ISBN 7-301-06638-4

I. 敦… II. ①神…②高… III. 敦煌学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427 号

书 名: 敦煌学五十年

著作责任者: [日] 神田喜一郎

责任编辑: 高秀芹 付 凌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638-4/K·032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5.75 印张 14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敦煌学五十年	(1)
敦煌学近况(一)	(25)
敦煌学近况(二)	(39)
内藤湖南先生与支那古代史	(50)
《内藤湖南先生与支那古代史》补遗三题	(56)
手捧贝塚教授的《甲骨文字》图版篇回忆林泰辅博士	(61)
狩野先生与敦煌古书	(68)
内藤湖南先生与支那古文书学	(83)
支那学者富冈桃华先生	(87)
回忆羽田先生	(107)
大谷莹诚先生与东洋学	(111)
董授经先生	(119)
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	(124)
汉文作家吉川博士	(125)
关于中国书籍	(129)
鹿田松云堂与内藤先生	(135)
《册府》发刊之时	(142)
《目睹书谭》序	(146)
《支那史学史》跋	(148)
《日本文化史研究》解说	(150)

2 敦煌学五十年

《桑原隲藏全集》推荐辞	(153)
陈列馆的地下室	(155)
上野有竹斋的中国古书画	(157)
《中国书画话》序	(161)
荷兰高罗佩著《书画鉴赏汇编》	(164)
大正癸丑的兰亭会	(167)
译后记	(180)

敦煌学五十年

进入 20 世纪以来,众所周知,各个领域的学问均有显著进步。我们所从事的东洋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可以说是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20 世纪的东洋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飞跃性进步的原因在于,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发掘调查工作成绩显著,相继发现了很多过去的学者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新资料。在大量出土的各种各样的新资料中,如果要指出哪一个特别有名,那么就要数中国河南省殷墟出土的甲骨遗物最为重要。稍微夸张点来说,这一重大发现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转折点。同时,殷墟发掘品也促进了东洋学研究的进步。

现在我想谈谈关于敦煌古书的话题。敦煌古书发现于甘肃省西部的敦煌。敦煌附近有一座鸣沙山,山中有莫高窟、也就是被俗称为千佛洞的石窟寺。古书就是在石窟寺中的一间里面被发现的。其中最古老的是 3 世纪末的文物,较晚的文物也都在 10 世纪以前。当时中国印刷技术尚未发达,这些文物均是手写本时代的東西。除了日本古代曾经遗留下一些类似的文物外,在中国本土还未曾发现过如此珍贵的东西,而且数量竟然超过数千卷。这一重大发现,使全世界乃至整个东洋学界为之震惊。

最早的发现者是英国的斯坦因(A. Stein)和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他们将大部分文物带回了欧洲。因而,当时敦煌古书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一时的新闻。被发现的文物中不仅包括书籍,还

2 敦煌学五十年

有大量的绘画及其他各种文物。但是对这个世纪的东洋学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书籍,因此将所有文物统称为敦煌古书。古书发现于1907年,而殷墟的甲骨最早是在1899年被发现的。两者自发现到现在^①,大约都经过了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台湾大学著名的甲骨学研究大家董作宾教授,曾在前年台湾发行的《大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甲骨五十年》的论文,这篇论文应该说是甲骨学研究的一篇总结报告。而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可以说是东施效颦,实际上敦煌学研究还未足五十年。但在敦煌千佛洞最初发现大量古书的确切时间是1900年。据说千佛洞主持是一个姓王的道士,有一天王道士偶然在闭锁的洞窟中发现了大量古书。关于古书的发现还有其他不少传说,但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发现的。后来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收买了王道士,并将这些文物据为己有。由此从时间上来看,“敦煌学五十年”的提法还是可行的。

所谓“敦煌学五十年”,这门学问的源起则各种各样。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批西洋人热衷于到中亚地区探险。最初这种探险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1890年英国军人鲍威尔(H. Bower)到中亚旅行,从库车带来了写在贝叶上的古梵文经。经英国梵文学者霍恩雷(R. Hoernle)的研究证实,这部经书比公认为最古老的我国法隆寺的贝叶经更古老。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以此为契机,以学术为目的的中亚探险便骤然增多。进入本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纷纷向中亚地区派遣大规模有组织的探险队。正如此前刻秃先生曾经介绍过的这些探险队的详细情况,每一支探险队都从中亚地区满载而归。众所周知,中亚位于中国和西方交界处,是古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这片土地上特殊的文化曾

^① 指作者发表本文的1953年。——译者注。



敦煌千佛洞局部

经盛极一时。因此这一地区保存着各种各样的珍贵遗物。对这些遗物进行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世纪开始兴盛的中亚学。1911年6月,在法国的法兰西学院首次由伯希和教授开设了中亚学讲座。敦煌学实际上是中亚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在中亚学中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因此有时也用敦煌学的名称代替中亚学。所以,在我国如果提到敦煌学,一般就有狭义和广义之说。今天无暇论及广义的敦煌学,只将范围限定在狭义的敦煌学上。

前文提到英国的斯坦因最初到达敦煌的时间是1907年3月,

时值日本明治四十年、中国清朝末期光绪三十三年。此前一年,也就是1906年,斯坦因受英印政府之命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旅行,一路探访古迹,最后到达敦煌。他在当地得知千佛洞发现古书的消息后,想方设法通过王道士获得了上千卷文物。与此同时,法国的伯希和于1906年夏天接受法国政府命令进行中亚探险,正好在1907年12月到达敦煌。伯希和是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远东学院教授。学院确切地应该叫做远东博古学院。他紧随斯坦因之后,于1908年3月3日及随后的几天内同样买通了王道士,将剩下的数千卷古籍送至法国。他本人则在同年5月离开敦煌向东进发,中途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月,经过郑州于10月到达北京。这里有些问题必须加以说明。斯坦因和伯希和都将千佛洞获得的古籍寄回了英国和法国,但当时他们都没有向学术界公布自己的所得。一般人都认为1908年10月伯希和到达北京后向中国学者展示了小部分古籍,由此才引起学术界哗然。但中国和日本得知敦煌古书之事的确切时间应该是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9月,也就是一年以后的事情。这当中时间上无法吻合。也有说法认为伯希和是1908年5月到达北京,这与离开敦煌的时间相混淆了,所以必定是不可信的。伯希和的确是10月才到达北京,但那时候他在当地并未透露任何风声就返回了河内。这种推测也合乎情理。伯希和虽然得到了敦煌古书,但还没有向远东学院的院长汇报,因而他不可能在北京将消息透露给清朝的学者。如果仔细调查《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便可以清楚地了解伯希和行动的确切时间。根据学报记载,伯希和于1908年12月12日回到河内(参照《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3期,第3—4卷,第588页),翌年,也就是1909年5月21日从河内出发,重访北京(参照《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4期,第2卷,第402页)。此次目的是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图书。这次他随身携带了少量敦煌古书并首次展示给中国学者看,时值

1909年夏天,伯希和从河内重返北京之际。1916年法国金石铭文学院出版的大型图书《东亚文丛》中也对此有所记录。该书第二册刊登了伯希和对敦煌古书之一《尚书释文》断片的长篇考证论文。文中第156页记载,“1909年,我对有关北京的文书的一些段片进行了研究”。1909年,即明治四十二年,这正是敦煌古书公布于众的确切时间。另外某些书中认为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途经上海、天津等地,曾经把敦煌古书拿给当地人看过等等,是不确切的误传。实际上那是1916年,即大正五年,伯希和再次到中国的事情,时间上与前述之事相差甚远。当时伯希和在上海广泛招待各界学者,使原本就轰动的气氛犹如火上浇油。其中参加招待会的一名学者叫叶昌炽,在他的日记《缘督庐日记》的丙辰年,即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条款中记录了当时的趣闻。上述误传必然是由此而来的,但却混淆了时间。伯希和自1908年3月在敦煌的千佛洞获取了古书后,立即不顾繁忙写信向探险队的最高指挥,著名的梵语学学者塞纳(E. Senart)做出了详细报告。报告信的日期是1908年3月26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以《在甘肃发现的中世纪图书馆》为题目,刊登在1908年7月—12月号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卷三,第3、4期上。敦煌古书公布于众的最早时间应该就是这一系列杂志。但我认为杂志发刊的实际时间可能更为靠后。明治四十三年,即1910年7月发行的京都文科大学学报杂志《艺文》第一年第四期中,登载了羽田亨博士题为《伯希和氏的中亚旅行》的文章,其副标题为“发现敦煌石室遗书的详细情况”,介绍了敦煌古书的最新消息。但文中并未提及伯希和寄给塞纳的报告信件。由此推测,登载此报告信件的杂志实际发刊时间应该是相当晚的。总而言之,敦煌古书最早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时间是1909年夏季,即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部分敦煌古书之时。另外,羽田博士的《伯希和氏的中亚旅行》一文在今天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文

中正确而简单明了地介绍了伯希和的行动和时间。但是后来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敦煌学的大家,却反而没有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这的确令人费解。一年之差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以为这在敦煌古书的研究历史上却是重大问题,因而对此不得不加以赘言如上。

关于伯希和重返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我手头上有一份遗留下来的珍贵记录,是东京有名的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店主留下的。也许有不少人对他都很有熟悉,此人名叫田中庆太郎。田中先生去年,昭和二十六年九月间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他于明治四十年左右曾在北京开过店铺。前文提到的1909年,即明治四十二年,田中先生当时正好住在北京。他曾亲自拜访过伯希和并看到了敦煌古书。那么田中先生就是最早亲眼看到敦煌古书的日本人。后来他以教堂生为笔名,在北京的日本人办的《燕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具体登载的是《燕尘》第二卷第十一号,发行日期是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时至今日,已经很难找到田中先生的文章和《燕尘》杂志,几乎也没有人知道这本杂志。恰巧我在两三年前听说名古屋有人收集《燕尘》杂志,于是千方百计拜托朋友借来阅读。我将此事告知田中先生,他也非常高兴,怀旧之情溢于言表,并告诉我他保存的杂志早在关东大地震中已被烧毁,没有留下任何资料。鉴于此资料不为人知的缘故,现抄录如下:

佛兰西东方考古学校(在东京河内)教授伯希和,获得了甘肃省敦煌县石室中所藏的经卷古书,归国途中路经北京。我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他在八宝胡同暂居的寓所,递上名片要求会面。我与他素未谋面,正在寻思是否会吃闭门羹之际,一个下人出来说了声“请”,便领我来到客厅。伯希和是个三十左右的青年绅士,有着儒雅的学者风度。我不通西洋语,于

是他使用流利的北京话开始了面谈。谈话中得知他已经通过两个朋友沙畹和梅特罗对我有所了解,因此谈话便可以畅所欲言。伯希和以研究清国西陲的地理古迹等为目的,前年从法国出发,途经俄国所属的中亚地区进入新疆省,在库车停留八个月,在乌鲁木齐停留两个月,在吐鲁番停留数周时间。调查研究途中在乌鲁木齐会见长将军时听说了关于敦煌石窟的消息,便经过巴里坤、哈密、到达安西,某位知州曾经赠送给他一卷古写本,伯希和认定就是唐代写本。于是去年冬季就一直在敦煌县停留了大约三个月,收罗了大批当地三危山下石室所藏的写经及其他文物。

伯希和说大部分古书已经寄送回国,接着就展示了随身行李中所藏的数十件物品。那都是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极贵重物品,例如有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经文、唐拓本等等,纸质看上去是黄麻、白麻、楮纸三种。其中老子化胡经等并不逊于天平经中的上等藏品。尚书顾命残页字体刚劲有力,看来的确是唐代人的作品。这些文物在西夏战乱时期被封存于石室内一直沉睡至今,所以室中所藏均为五代以前的物品,而没有宋以后的东西,特别是没有任何用西夏文字记载的物品,这是确凿的证据,也是学术上伟大的发现。我本人虽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但凭着爱好者的眼睛来判断也能够知道所见之物都是一些上佳的珍品。伯希和获取珍宝的消息很快传开,北京的士大夫中的学者以及对古籍感兴趣的人都纷纷访问他的寓所,大家看到这些珍品,人人都为之动容。我想记录所见所闻,在观看了这些古书的人当中,罗叔言曾经对此有所记载,因为他的见解比我更加准确,故转录如下。

在这里田中先生提到罗叔言一段,就是指罗振玉先生所写的

题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汉文文章,田中先生转录后又加上了自己的意见。此处姑且省略,下面接着引用结尾:

九月四日,北京的读书人在六国饭店举办了伯希和欢迎会。当天的出席者包括宝侍郎、刘少卿、徐祭酒、柯经科督学、恽学士、江参事、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等其他数十人。这是一次群贤毕至的盛会。遗憾的是罗叔言因贵体有恙而缺席。恽学士举杯祝贺勤奋的伯希和获得天赐宝物并表示了羡慕之情。伯氏则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为了学术目的而奉国家之命进行考察,只是偶然中获得了宝物。现在物品虽然归法国政府所有,但是学问为世界共通,他会尽力满足有摄影、誊写希望的要求。伯希和应酬完北京的士大夫们后,于九月十一日晚上乘坐从前门出发的火车经由西伯利亚归国。不难想象今后伯希和将会不断地发表他的研究成果。

田中先生的文章就在此处画上了句号。当时的情景跃然纸上,北京学者们的惊诧之情肯定非同一般。出席招待会的宝侍郎即是当时的学部侍郎满洲人宝熙。徐祭酒是徐枋,柯经科督学是以编纂《新元史》而闻名的柯劭忞。江参事是江瀚,字叔海,是研究《毛诗》的专家。蒋伯斧是本名叫馥的音韵学家。董比部曾几度东渡日本,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康。这些人中很多是当时北京新开设的京师大学堂的有关人士,罗振玉先生其时正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督学。另外还有一个人叫王仁俊,上文虽不曾举出名字,但他也必然身列其中。此后不久,他便出版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此人字捍邦,出身于江苏省吴县,即苏州人。苏州学者中同样是敦煌学研究家的曹元忠对文字方面造诣颇深,当时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尔雅》、《说文》,同时兼任学部的编译图书局次长。以

上提到的这些知名人士见到敦煌古书后无不瞠目结舌,特别是罗振玉、蒋伯斧及董康等人。后来中国的敦煌学就是由罗振玉、蒋伯斧等人开创的。田中先生及罗振玉先生迅速向日本的内藤湖南先生和狩野君山先生通报了敦煌古书的消息。当时内藤和狩野两位先生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都居住在京都,因此日本的敦煌学首先开创于京都。根据田中先生的文章记载,伯希和于9月11日傍晚离开北京,途中在俄国暂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于10月24日平安抵达巴黎。伯希和回到巴黎后立即成为注意公众的焦点,金石铭文学院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接着,12月10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了由法国亚细亚协会及地理学会共同主办的大型欢迎会,其盛况史无前例;据说听众超过四千人,巴黎索邦大学宏大的阶梯讲堂中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文提到的伯希和探险队的派遣者及最高指导者塞纳主持了会议,伯希和就探险队的行程和成绩作了汇报。当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照《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十卷,第1期,272页。由此,法国的敦煌学随着伯希和归国便开始兴盛起来。斯坦因也同样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敦煌古书及壁画,但他1909年5月经由印度将物品送到大英博物馆后,就一直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中,未及整理,因而英国的敦煌学就稍稍滞后了一些。

暂且不论法国和英国的情况,我想更详细地介绍日本敦煌学是如何兴盛的。上文提到北京的罗振玉和田中先生向内藤湖南、狩野君山通报了敦煌古书的消息,由此我国的敦煌学始发于京都。这是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初的事情,十一月十二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以大标题刊登了《敦煌石室的出土文物》的报道。这是我国对敦煌古书最早的新闻报道,引起学术界的瞩目。

敦煌石室的出土文物

△十余箱千年前的古书

△法国人尽悉囊括回国

最近东京某氏得到了清朝文部参议官罗振玉的报告,此报告非同小可。据报清朝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三危山下,有一条小河,河前有三座寺院,当地人分别称为上寺、中寺和下寺。上、中两寺均是道观,惟独下寺是佛寺。离寺左方不远处有数百个石室,俗称千佛洞,早在唐代就闻名于世,文人称之为莫高窟。正如千佛洞其名,各洞中皆有壁画,上面雕有千姿百态的罗汉佛像,下部刻有雕刻工匠的画像、姓名和籍贯。光绪二十六年(明治三十三年),在整修右侧石洞时砸开其中一面墙壁,意外地发现了埋藏在里面的大量书卷。因为地处西部边远地区,尽管古书卷已经开始流落到民间中去,但并没有引起世人的瞩目。光绪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冬,驻北京的法国传教士伯希和旅经清国西北边陲新疆省。他到达迪化府时,伊犁将军长庚将在石室发现的一卷古书送给他,并告诉他古书被发现的消息。于是伯希和南下进入甘肃省,在安西州牧时,又从某氏手中获得了同样是在石室中发现的一卷书。伯希和长期居住在北京,向来就对中国古书有浓厚兴趣,因此一眼便认出这是唐代写本。于是他火速赶到石室所在地四处寻访,最后购得古书十余籍。伯希和所购之物不过是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迅速四处流散,已经无法收复,令人倍感痛惜。伯希和携带所获之物返回北京后,将其中经史子集四部及经卷中精品立即送回法国,而罗氏上月下旬费尽

周折才看到的只是剩下的几卷。罗氏认为这些是西夏战乱时埋藏的古书,距今已有九百七十余年。

伯氏寄回法国的书目略举如下: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图。太公家教。辨才家教。孔子修问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百行章。何晏论语集解一、二、六卷。毛诗卷九(郑注柏舟故训传)。范宁谷梁集解(闵公至庄公)。孟说秦语中晋二。庄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记室修要。文选李善注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卷。冥报记。新集文词教林。秦人吟。子赋。李若立略出籀金。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卷。唐韵。切韵。(小板五代刻本,均残)。唐礼图。辅篇义记二卷。李荃阕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陈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咏。

以上书目均是珍本,例如其中唐韵的五代刻本,就颠覆了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刻本是从宋开始的定论。罗振玉所见的大部分是经卷拓碑,例如尚书顾命之残缺本、化度寺邕禅师碑等等,足以使有考古癖好的学者们大为震惊。其珍贵程度虽然比不上我国京都高山寺的竹制经帙,但是这在中国则是空前的大发现。

以上是《朝日新闻》记事报道的全文。文章没有署名,但可以推断执笔者是与朝日新闻社有密切关系的内藤湖南先生。之所以如此推断,是因为12天后,即11月24日至27日四天内,内藤先生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署名连载的解说文章,题为《敦煌发掘的古书》。文中出现“最近已在报纸上提到过大致情况”的字眼,由此可以推测12日记事的执笔者应该是内藤先生。根据12日记事,先生最初是从东京某人那里听到罗振玉发出的消息的。这里提到的

某人就是当时在东京本乡经营文求堂书店的田中治兵卫老人,也就是田中庆太郎的父亲。因此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始末》的消息,内藤先生就写了12日的记事,24日《敦煌发掘的古书》文中开头也明确地提到这一细节。内藤先生开始对发现敦煌古书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12日的记事中还误以为伯希和是法国传教士。但是不久之后,北京的罗先生又把新出版附带照片的《莫高窟石室秘录》寄送到内藤先生、狩野先生手中。所以24日至27日报道的资料非常详尽,与12日的记事比较就显得有根有据,对伯希和的身份进行了较确切的订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京都大学文科诸教授之间已经开始了对敦煌古书的研究。由此看来,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应该是从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中旬开始起步的,距今已经有44年的时间了。内藤先生写的《敦煌发现的古书》全文收录在他的《目睹书谭》中,是很方便查找的。当我读到那篇11月12日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敦煌石室的出土文物》时,耳边仿佛听到了我国敦煌学诞生之初的呱呱啼声,此乃我国无比珍贵的历史性文献,很希望诸位有机会也能找来读一读。

明治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位于现在的冈崎府立图书馆二楼连续召开了第二次总会,并且开展出了由北京寄至内藤、狩野两位先生处的敦煌古书照片。图书馆是新建的,式样在当时颇为摩登,加上《朝日新闻》的宣传效果,场面显得十分热闹。二十八日,京都大学教授们为此作了各种各样讲解性的讲座。首先是小川教授以《总论及地理》为题,介绍中亚探险史及伯希和的敦煌旅行,对敦煌的地理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接着,内藤先生的演讲题为《西州志残卷·唐太宗温泉铭》;富冈讲师的演讲题为《尚书顾命、尊胜陀罗尼、金刚经、化度寺碑》;滨田讲师的演讲题为《壁画、雕刻》;羽田讲师的演讲题为《摩尼经残卷》;狩野教授的演讲题为《老子化胡经》;桑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